

印度经济能够赶超中国吗？

——兼论“中印比较”的意义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李 晓

自 2000 年起，中国一直都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耀眼的明星，“中国奇迹”成为该论坛最具凝聚力的话题，然而近二三年来，印度却取代中国成为该论坛的主题。在 2006 年 1 月 25 日开幕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无处不在”（India Everywhere）的宣传风暴席卷了达沃斯，有关印度经济赶超中国的所谓“龙象之争”或“龟兔赛跑”的话题充斥论坛。中国人开始尴尬，继而开始警觉，于是以从未有过的兴趣关注起身边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有关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或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的话题跃然纸上。

那么，印度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它能够赶超中国吗？“中印比较”的意义何在？本文试图就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中印经济比较：表象与真实

1. 就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指标等方面来看，现阶段印度同中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且两者的经济增长条件明显不同。

经历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印度教徒式增长率”的低速（年均 3~3.5%）发展，80 年代印度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进入 90 年代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升。1992—2002 年平均为 5.5%，2004 年为 7.5%，2005 年为 8.1%，2006 年预计为 7.5%~8%。虽然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都在 9% 以上，但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大有赶超中国之势。这正是近年来海内外“印度经济将赶超中国”之呼声日趋高涨的现实背景。

现阶段，中印两国经济规模的总体差距仍十分明显：第一，中国的 GDP 总量是印度的两倍多（1978 年，中国人均 GDP 是印度的 2/3，现在是印度的两倍）；第二，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大于印度，是印度的 6 倍；第三，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是印度的 10 倍；第四，境外投资累积中国是印度的 2 倍；第五，中国的外汇储备更远远多于印度；第六，经济资源（GDP）量占世界比重 2000 年中国为 11.16%，印度为 5.46%；长期经济增长趋势

占世界总量比重 2010 年中国为 17.66%，印度为 6.2%，相当于中国 1990 年的水平。

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同样十分明显：第一，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人为 7.11 年，印度人为 5.06 年（1999 年）；第二，国民识字率中国在 90% 以上，印度为 60% 左右，中国成人文盲率不到 5%，印度则高达 32%（2003 年），成年女性受教育比例中国几乎是印度的两倍，但印度是个奉行精英主义的国家，小部分人受教育水平非常高，据 2005 年度世界发展报告，高级工程师拥有率印度为中国的两倍；第三，人均寿命中国为 71.8 岁，印度为 60.8 岁（2001 年）；第四，印度 5 岁以下的儿童有 46% 营养不良，中国则不及印度的 1/4，婴儿死亡率中国也低于印度 1/2。

与此同时，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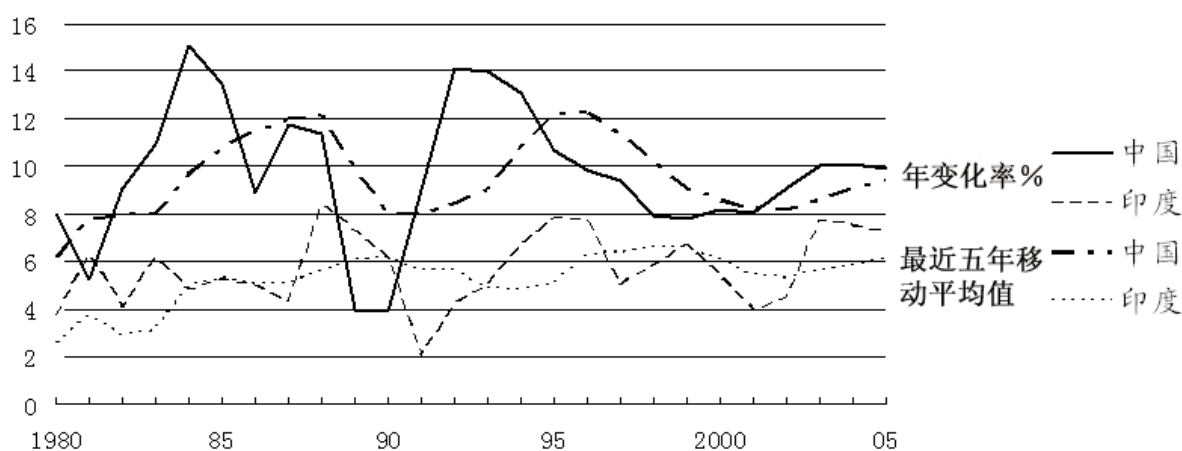
（1）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好于印度，但印度的微观经济指标尤其是企业业绩大多优于中国。据 2003—2004 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指数排名第 25，印度第 52，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指标方面印度则领先于中国，2004 年企业竞争力指数排名印度为第 30，中国为第 47。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同中国国有经济仍旧占据核心产业领域和自然垄断产业的状况不同，印度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如 Iforsys、Wipro、Ranbaxy 和 DrReddysLabs 等，而且在印度股票市场上 9000 多支股票中，有 60% 不是公营企业，即现阶段印度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私人企业来推动的。

（2）印度的金融体系比中国更加完善，效率更高。印度的国民储蓄率只有中国的 1/2，引进外国 FDI 的总额也只有中国的 1/10。因而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外资拉动型”不同，是靠内资拉动的。相比而言，中国企业更多地靠银行融资，印度企业则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目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 27 家政府银行，25 家私人银行，46 家外资银行，有 47000 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此外还有近 100 家商业银行。由于民主政体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信息和金融市场的规范化程度和透明度较高，印度经济的证券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印度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 GDP 的 80%，而中国则不到 10%，说明印度经济证券化程度是中国的 8 倍。这样，它配置资源、调动资源和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要比中国强得多。因此，与中国的外资引进多为外商直接投资不同，印度引进的外资多为流动性高的金融资本，流入印度股市的外资占其引进外资总额的 60% 以上。当然，印度也要为此承担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风险成本。2006 年 5 月外资的大量撤出就导致印度股市暴跌。

（3）中国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明显好于印度，印度经济发展的软件基础则优于中国。

迄今为止，印度尚没有一条高速公路。2003 年，印度曾计划要建设第一条高速公路，但至今仍未开工。从新德里到著名的泰姬陵所在地亚格拉大约只有 130 公里的路程，但笔者却乘车走了 3~4 个小时。新德里机场启用于 1960 年代，当时如此规模的机场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但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破旧不堪。印度虽然号称世界软件大国，但在星级宾馆上网并不容易——速度不快、费用很高。2003 年，印度基础设施投资额只有中国的 1/3，占 GDP 的比重为 3.5%，中国则为 10.6%。印度要赶上目前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尚需 8000 亿到 1 万亿美元的投资，但目前每年的投资额却不到 100 亿美元。即便印度迅速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若要赶上现今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至少也需要 20 年的时间。印度的软件优势除了金融、资本市场发达和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以外，在英文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和专业化的文官系统等方面也明显强于中国。特别是英国对印度几百年的殖民统治造就了印度一大批职业化水平很高的经理人员，其企业管理经验和战略眼光都堪称世界一流。这也正是印度 IT 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 1 中国和印度的实际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IMF。转引自《金融时报》中文网，2006 年 2 月 17 日。

2. 印度经济增长的原因、影响及其趋势。

首先，关于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的原因，许多国内外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 1991 年拉奥政府实施经济改革的结果。事实上，印度自 1947 年独立以来经济就一直在持续缓慢地增长，进入 80 年代以后开始加速，整个 80 年代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 5.6%。如图 1 所示，在 1980—2005 年间印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 6%，且 5 年移动平均值也未明显偏离这一水平，虽然过去 3 年其经济增长率超过 7%，但在此前的 3 年里仅为 4.7%。因此，印度经济近年来

的增长不过是自 80 年代以来经济景气过程的一种持续，而非结构性或制度性调整所致。事实上，印度的经济改革面临着重重困难，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有限。

其次，人们称颂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其 IT 产业的迅猛发展。自拉吉夫·甘地时期开始，印度便着力发展 IT 产业，将信息产业确定为经济增长极。最初印度的计算机生产厂家只有 80 家，1985 年就增加到 150 家，1986 年后软件业兴起，出口迅速增加。1998 年瓦杰帕伊政府提出，要使印度在 10 年内成为“信息技术大国”，并成立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区亦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现阶段，印度软件出口到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 500 强企业中有 200 多家已向印度外包了软件开发业务，其出口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并已经占到印度出口额的 10%，预计到 2008 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将达到 850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 33%。关于印度 IT 产业发展的原因，许多学者认为是印度金融市场发达、企业家精神充沛以及高素质的高等教育等因素所致。在笔者看来，印度 IT 产业之所以能够得到大发展，有着其深刻的路径依赖背景，即为了绕开“两个印度”的巨大陷阱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结果。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印度——贵族化的印度和平（贫）民化的印度，或者说高度发达的印度与高度落后的印度。这个特征经过英国殖民统治更加强化了。印度的政治是贵族化的，印度社会是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并存，印度经济也同样带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与中国民族资本的形成历程不同，自 19 世纪后期印度民族工业开始起步以来，一直与英国殖民经济并驾齐驱。到 1947 年独立前，印度民族资本控制的资产已经与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的资产相当。这部分民族资本也同样是半个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是，由于“两个印度”的巨大差距，印度民族资本的发展长期倾向于技能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尽量绕开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在印度 10 亿人口中，有 6-7 亿是穷人，其中 2.5 亿人生活在最贫困线以下，全国 80%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有近 1/3 的人口是文盲，虽然印度高等教育比较先进，但基础教育发展却相当落后，结果只有极少部分精英或贵族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保护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印度政府独立伊始便制定了《产业纠纷法案》，规定雇佣 100 人以上的企业解雇职工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但该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却使私人企业对增加雇佣持谨慎态度，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相对较小的技能密集型制造业和非常庞大的技能密集型服务业的扩张。在 1990—2003 年间，中国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为 12%，印度只有 6.5%，远低于其服务业 7.9% 的增长率。印度 IT 产业的发展正是为了绕开“两个印度”困境，凭借教育的贵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科研发展的贵族化特征，直接与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接轨”。此外，IT 业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现行经济体制之外的

新的增长点。换句话说，自 1991 年印度经济改革以来，其制度调整与变革的力度并不大且步伐缓慢，但却少有对新兴的信息产业、外包服务业的限制和干预，而 IT 产业的大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

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增长势头是可持续的吗？它能够持续多久？这涉及到经济增长效率的高低及其判断。

一些学者以印度金融体系的效率更高为由得出印度经济增长效率高于中国的判断。但是，金融体系的效率同经济增长的效率并不能等量齐观。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标准有许多，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两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能否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具体说就是能否拉动就业的增加。

由于中印经济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差异巨大，两国经济结构及其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不同。印度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高达 50-60%，而中国则刚好相反，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50-60%。同印度“发达国家化”的产业结构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无疑可以更好地长期吸收就业，拉动国民收入的增长。据统计，目前印度的人口负担率（低于或高于标准劳动年龄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比中国低，要到 2030 年前后才会超过中国，但现阶段中国的就业率却高于印度近 20 个百分点。同中国相比，印度是典型的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例如，在 1993—1994 年和 1999—2000 年间，印度经济增长率均达到 6.5%，但就业增长率仅为 1%。2005 年，印度 20-39 岁人口已超过 4.3 亿，如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些廉价劳动力将会成为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1999 年 3 月吸收就业仅为 28 万人、预计到 2008 年增至 220 万人的 IT 产业是无法发挥作用的。IT 业的一枝独秀对未来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究竟有多大，恐怕不容乐观。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IT 产业的发展正在对“两个印度”特征的强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 IT 产业中心班加罗尔所在的南印度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带动了不动产、商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消费热潮，导致消费增长方面巨大的南北差距。就 1990 年代以来农村消费市场的比率变化来看，北印度地区由 16.4% 下降至 12.2%，而南印度地区则由 38.7% 增至 57%。

此外，许多国人担忧印度因其 IT 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办公室”，因而可能超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事实上，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都是处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外包生产链条的最底端。不同的是，虽然两者的地位相近，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会比印度所谓的“世界办公室”地位更能够持久拉动经济增长。因为相对而言，前者更有助于产业结构的有效提升和就业增加，后者将更加强化经济的“贵

族化”特征。从这一点来看，大胆断言印度经济在短期内难于超越中国经济是有道理的。

再次，关于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理性的学者未必十分乐观。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 Shankar Acharya 明确驳斥了印度经济增长率将超过中国的观点，认为印度中期经济增长率很可能维持在年均 6% 的水平，即印度将继续保持 1990 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日本著名的印度经济问题专家绘所秀纪也同样认为，在今后相当时期内印度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 6-6.5% 的水平，按目前印度人口 1.7% 的增加率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率大约仅有 4.5% 的水平，到 2020 年前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能达到 1000 美元。1998 年，以印度总统卡拉姆为主席的“技术情报、评价与展望委员会”（TIFAC）公布了题为《2020 年的印度——为了新世纪的构想》的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提出到 2020 年要将印度建设成为“富裕的印度、强大的印度和发展的印度”的口号，但关于届时印度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规划目标却仅仅超过目前中国的水平——1539 美元（2004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1290 美元）。这只是较低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准。

总之，虽然印度已经站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大门口，但倘若没有就业的大规模增加以及全体国民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享，它肯定是难以跨越这道门槛的。

二、“中印比较”的意义何在？

中国与印度之比较犹如阿基米德的两条平行线，除了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相近以外，两国在文明体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很难设定一个有效的相互比较的坐标系。

如果将中印比较仅仅限于所谓“龟兔赛跑”的游戏或寓言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但也许正是因为无法设定相比较的坐标系，对两者进行比较的意义可能远大于那些可以设定坐标系的比较对象（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比较”意义。我们需要以更加宏大的视野来认识中印比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

1.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软件条件还是硬件条件？

这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不断争论的问题。虽然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体制、制度等软件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或基础动力，但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即便一些国家具备了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甚至政治体制上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如印度），但落后的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的不具备却成为影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而那些体制、制度尚不完善甚至是专制政体的国家，一旦具备了发达的基础设施，其经济增长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则非常迅速。近年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几乎都将基础设施的落后视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相当长时期以来，印度经济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电力、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的严重滞后。据日本学者于 1999 年 9 月、2003 年 3 月和 9 月三次对在印日资企业的调查，它们在印经营面临的重大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其次为劳资关系不稳定和腐败等问题。甚至在他们看来，现今印度经济改革的速度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基础设施落后。事实上，虽说印度 IT 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但其持续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掣肘。一方面，即使在号称“印度硅谷”的印度软件业中心班加罗尔，不仅道路状况非常恶劣，而且经常停电、断电，“两个印度”的困境在这里格外明显。尽管印度人经常为自己 IT 产业的发展而感到骄傲，但在人口同样众多的中国，电力生产是印度的 3 倍，电话和手机拥有量是印度的 6 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才不足。英语水平和数学天分是印度人具有的两大优势，问题是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熟练掌握英文的人不过只占总人口的 5%，在美国硅谷活跃的印度人才不过是一部分精英而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个印度”的特殊反映，而印度自身 IT 业的发展已经开始面临着人才不足的问题。因此，如何克服基础设施（教育）不足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印度经济的未来。否则，像 IT 业那样的先进产业将不过是印度经济中“新的飞地”。

2. 什么样的政府更有助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

现代发展经济学格外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政策在一些国家有效而在其他一些国家无效？为此，人们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更接近新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行为有关。不论是具备了软件条件还是硬件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将这些条件有效地导向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向的政府效率。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与发展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首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政府的功能非常必要而且重要。赛义德·尤素福(Shahid Yusuf)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而言，组织失败是阻碍进步的顽疾；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必然随着信息流动的不断增多和国家机构承担复杂的调控任务的职责的增强而增加。纵观独立后印度经济发展历程，印度政府效率的低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即便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制定了详尽的经济计划，但其实施计划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因为它们的政府是“软政府”。迄今为止，印度人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时一直在反思让其惊讶的三件事情：一是印度早在 1950 年代便提出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规模，但由于其复杂的宗教、民族和政治等问题，时至今

日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中国在 1970 年代末提倡和制订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增长迅速得到了控制；二是当 1960 年代初中印两国因领土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军队迅猛突击并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之后，印度国会还在为如何对付中国军队进行激烈的辩论；三是印度早在 1960 年代就曾设想要搞“经济特区”，但一直悬而未决，而中国在 1979 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便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事实上，早在英迪拉·甘地第二次竞选时就曾明确提出过印度需要一个“能工作的政府”的口号，然而印度各级政府工作效率之低下依然令世人惊愕。

世界银行 2003 年初的一份关于印度投资环境的研究报告披露了印度政府工作效率之低下：在印度要想开一家公司需要申请 10 项许可，中国只需 6 项；在印度办理各种手续所需的平均时间是 90 天，中国只需 30 天；外国公司要想进入印度需要中央政府的 43 道和地方政府的 57 道审批手续，而在中国则少得多；在印度办理海关手续平均需要 10.6 天，而中国只需 7.8 天。世界银行还曾公布了 2004 年中印两国“治理指标”的比较数据（见图 2）。由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印度在“话语权和问责制”方面较中国有明显的优势，在“防治腐败”与“法治”两项指标上，印度也获得了比中国较高的评价，但在“监管质量”和“政府效率”两项指标上，中国的得分却明显高于印度。这说明中国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远远超过印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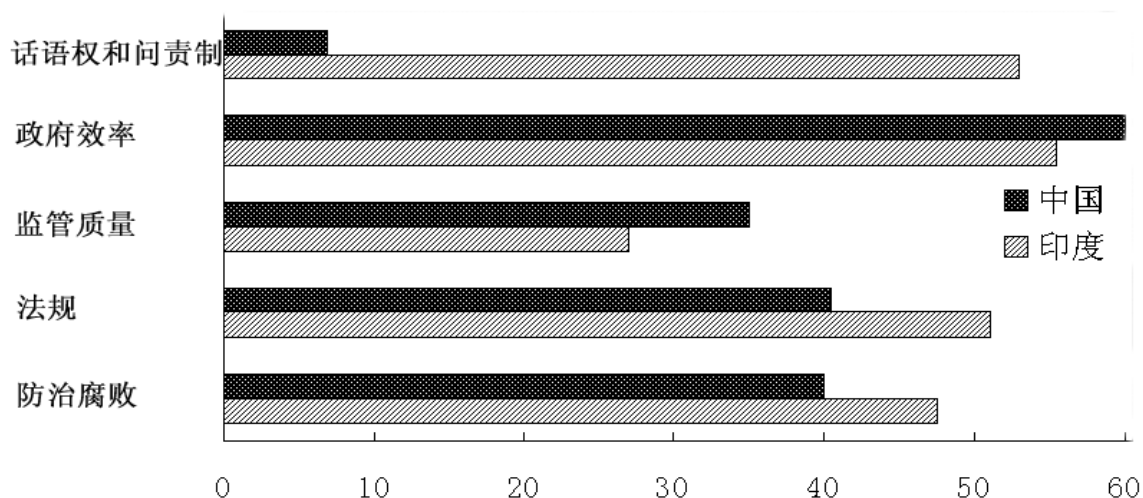
3. 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内外有关中印比较的话题潜含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命题：何种政治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许多学者认为印度经济将赶超中国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印度的民主政体将使印度未来经济增长更有“后劲”；二是如上所述，认为印度的金融体系更加有效率，因为它比较透明、规范或法治化的。这实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强调印度的民主政治体制有助于印度的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不能仅靠个人偏好或意识形态理念来分析，而是要认真分析两个问题：一是政治体制与政府效率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二是印度民主体制的真实内涵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具体涵义是：针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民主政体注定是有效率而非民主政体必定是无效率的吗？

总体来看，在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标准来衡量，那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如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实行非民主政体的国家（如东亚各国）。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学者看来，印度经济近年来的迅速增长似乎要对这种现象进行证伪。但是，正如发展经济学家拉·明特（Hla Myint）指出的

图 2 2004 年中国和印度的治理指标



资料来源：World Bank。转引自《金融时报》中文网，2006年2月17日。

那样：不论政治体制如何，大部分政府都会为了保住政权而做任何事情。一句话，政府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市场不发育或残缺的初始条件，拥有一个“强政府”对发动和推进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指出的是，“政府强度”并非是“强政府”的惟一内涵，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具有较高的“政府质量”即政府理性、政府效率和政府自律。即便一些国家如东亚各国、各地区的政府曾拥有很高的“政府强度”，但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具备了较高的“政府质量”，它们的经济增长绩效格外显著。相反，印度的民主政体对于发动经济增长而言，不仅“政府强度”不够，“政府质量”尤其是其政府效率也非常低下。例如，面对资金短缺和工业化的重任，确保长期、稳定的资金供给至关重要。为此，东亚各国几乎都是依靠很高的“政府强度”与“政府质量”，用提供特殊优惠的方式将财政特别是金融系统引导向政府制定的产业发展目标和主导性产业组织，并以此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从印度的情况来看，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其金融系统更有效率，但其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那种理性的银行自主型投资体制无法形成以产业资本投资为主体的投资体制，使得资本与产业的结合程度非常低，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就业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这样的银行或金融系统虽然自身经营风险很小，但宏观经济效率却不可能高。印度的政治体制显然无法迅速实现这种投资体制的转变。

经验证明，政治体制与政府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两个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社会经济发展初始条件非常落后的国家来说，依据国情提高“政府质量”并为此确定必要的各种制度安排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两者的未来而言，拥有较高“政

府质量”者必然胜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GDP 的竞赛不过是制度竞争的表现形式或结果。

第二个问题即印度民主政体的本质同样十分重要，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印度政府的效率为何低下。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政治体制无疑是民主政体。但印度政体有两个显著特征：它是殖民地时代的遗产，同时也带有深刻的印度传统文化和宗教的色彩。这决定了印度的民主政体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就是政治体制的宗教化和种姓化，这两个特点极大地限制了其民主政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任何制度安排都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印记。印度民主政体的形成同样也摆脱不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自公元前 6 世纪开始，印度教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虽然在公元前 322 年建立的孔雀王朝尤其是在阿育王执政期间曾将佛教奉为国教，而且在 7 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多次入侵特别是 13 世纪初德里苏丹帝国建立后曾将伊斯兰教奉为国教，但印度教经过多次改革迄今依旧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近 50%，其他有佛教、耆那教、祆教（parisi）、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等；除英语外，印度约有 1500 种语言，其中 14 种为官方语言。同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印度教社会中出现了阶级压迫、种族压迫相结合的种姓制度（瓦尔纳制），形成了婆罗门（负责宗教祭祀）、刹帝利（负责国家行政管理）、吠舍（从事工、农、商等）和首陀罗（从事所谓污秽职业的人）四大种姓，此外还有所谓的旃陀罗即贱民。随后在公元 4 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又形成了按职业划分的所谓阇提制，使得种姓制度更加固定并细化。据说，今天的印度有几千个亚种姓。

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讲求“作业”（羯摩，即行为）和轮回转世。受到宗教的影响，印度人及其生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由于信奉万物有灵，他们再穷困潦倒和饥饿也不会杀生，所有的动物都与他们和平共处。所以，如同在发达国家一样，印度的鸟儿是不怕人类的，所有的野生动物不会被捕去吃掉。虽然印度的河水污染严重，但除此之外，生灵之间的和谐在今天的中国难以见到。另一方面，由于种姓制度被长时期宗教化，养成印度人包容、天性乐观与温和的性格。在低种姓的穷人看来，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自己之所以成为穷人，是各自在前世的修行（“作业”）不同所致，因而必须在自己现在的位置上苦于“作业”，转世方可幸福。这种性格肯定很大程度上泯灭了印度人的进取意识，但却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促进了职业和手工艺的专业化发展，稳定并发展了分工和相互依存的交易，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穷人不妒忌富人，也少有杀富济贫的意识与观念。事实上，印度历史上像中国那样的周期性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从未出现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由来自西北方向的异族入侵所致。同中国相比，种姓或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与合

作而不是阶级斗争，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主流或“动力”。调和，成为印度社会发展中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特征。

自印度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开始，其复杂的宗教问题便无时不在影响着未来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之父甘地（1869—1948）与一般政治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他主张把政治与宗教揉为一体，推行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并认定自己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原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试图将印度教传统中的调和或和谐的非暴力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当中来。在他看来，应把追求真理作为人和社会一切行动的最高原则，真理是神；追求真理的道路只能是非暴力的，非暴力就是爱，是人的本性；真理只有用无限的爱才能得到，若采取暴力只能是背道而驰，陷于黑暗的深渊。这正是他主张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应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思想基础。[1]甘地自身不仅最终死于宗教仇杀，其政治宗教化主张对独立后印度的政治发展进程也是一个巨大的负遗产。虽然从尼赫鲁政府开始，一直致力于政治的世俗化，但其强烈的宗教色彩一直未能改观，“印度教教派主义”与“伊斯兰教教派主义”的严重对立甚至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流血冲突，[2]并严重影响着当代印度政治发展进程，这实际上也是迫使尼赫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采取“公平优先”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

种姓制度作为一种被宗教神圣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印度政治的世俗化努力，使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原先众多的种姓制度已经逐步演变成三个大的种姓：高级种姓、中级种姓和低级种姓，并各自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种姓制度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直接相关，一方面是各种种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未消失甚至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则是各个政党不断利用种姓的冲突来争取更多的“票田”，结果反而加剧了种姓意识的复活，导致更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弱化了政治世俗化进程。1978年，印度政府曾设立“曼达尔委员会”，负责调查表列种姓（即原贱民）和其他落后阶级的生活状况并提出解决措施。1980年该委员会建议按照人口比例为落后阶级保留政府和国有企业中的职位。1990年，印度人民党政府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宣布执行这个报告。结果引起意想不到的全国骚乱，高级种姓强烈反对，举行游行示威并引发流血冲突，几个月内仅自焚的学生就多达75人，有200多人死亡。结果，使已经被逐步淡化的种姓问题再次凸显出来。政治组织和政府内部、社会各界的种姓营垒更加对立。

显然，这是一种多元、有限的民主政体。虽然尼赫鲁试图用一种科学理性及其制度安排来引导印度走出传统的神秘主义泥潭，然而在社会阶层、等级森严且缺少统一价值标准的社会里，民主只能是少部分人的游戏。按照奥尔森（M.Olson）的结论，各种特殊集团（如宗

教、种姓等)的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使政治社会中的分歧加剧,导致“脆弱政府”的出现。美国经济学家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使人们很难在回应危机的政策变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在印度这种社会阶层极其分化、充满冲突的社会里,当没有一个群体强大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使国家就范的时候,民主过程往往能在公共领域建立复杂的制衡制度,并在分赃(配)时在意见不合的精英集团之间建立详细的公平规则。但这一过程却产生“制度化的怀疑”(institutionalized suspicion),国家利益与私人企业联系密切、和谐一致,反而会引起其他利益集团的抗议和强烈不满,因而印度政府很难具有“包容性利益”,无法出现东亚国家政府那样的与私人企业的紧密合作。

政治宗教化与种姓化的发展对印度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两个印度”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严重左右着印度政治发展与政府决策的过程。这必然导致印度民主政体的“调和”功能远远大于其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功能。

1947 年印度独立后,自尼赫鲁开始,经英迪拉·甘地一直到拉吉夫·甘地,印度历届政府一直试图以费边式社会主义政策改变印度的贫穷落后状况,调和各宗教团体、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建设所谓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3]在社会正义、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偏重前者,一直是印度政府的施政核心。从这一角度来看,印度政府与拉美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极为相似——更加关注社会调和而非经济增长。但经验表明,“两个印度”的巨大鸿沟以及复杂的宗教、种姓矛盾,不但使尼赫鲁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目标未能实现,英迪拉·甘地在 1960 年代末采取的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亦同样受到严重的阻滞。虽然自拉吉夫·甘地政府开始试图进行经济改革,试图扭转“调和”重于增长或效率的政策目标,1991 年印度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也明确制定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目标,但印度社会发展的传统痼疾依然故我。

印度今天的经济增长是在其传统社会结构未加改变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其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是激化还是弱化社会矛盾与冲突,未来印度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问题的解决:一是能否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使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被更广大的民众分享,减少或消除“两个印度”的鸿沟;二是能否提高政府效率,提高“政府质量”,印度的经验证明,高质量的政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最为稀缺的资源。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均与印度传统文化及其社会结构高度关联,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国家文化传统的变革远非朝夕之功。因此,肩负着沉重的历史遗产,不能不让人担忧印度经济改革是否会掉入“印度教徒式速度”的陷阱。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是 21 世纪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印度文明同中华文明是两个不

同的文明系统，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之所以现阶段两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刻意地进行所谓的“比较”，就在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两者都不得不上与了与世界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两条原本不相交的“平行线”出现了历史拐点。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印比较可能比中俄比较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历史意义。

印度经济虽然在 1950—1970 年代增长缓慢，但它从未中断过增长，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而中国在 1950—1970 年代的经济增长出现过大起大落并一度中断，只是 1980 年代以来才开始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印度人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未来，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却充满担忧与焦虑。这无疑是国内目前掀起中印比较热潮的深层次背景，也再一次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这同 1990 年代初期国人面对苏东巨变时无知的“窃喜”与自豪相比，是一个进步。

注释：

[1]对于印度的未来，甘地认为它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社会，而应是一个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没有剥削没有暴力的社会；现有的大工业可以保存，但它是为小生产服务的；现有的城市可以继续发展，但它必须为农村服务。

[2] 最重大的冲突之一，是 1990 年代初期的“阿约迪亚寺——庙之争”。阿约迪亚是北方邦的一个小镇，有一座 1528 年巴布尔军队入侵时建立的巴布里清真寺。印度教徒认为这是在摧毁原来的罗摩庙的基础上建立的。但穆斯林否认这种说法。印度教徒试图在清真寺内祭祀罗摩大神，导致两者发生冲突。印度人民党一直试图利用这个争端来扩大自己在印度教徒中的影响。1980 年代中期由包括印度人民党在内的“同盟家族”挑起冲突。1989 年 11 月，世界印度教大会在巴布里清真寺实行象征性的建庙奠基仪式，得到人民党支持，并利用印度教传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所谓“战车进军”，大批印度教徒冲进清真寺，导致严重的宗教冲突，死伤惨重。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才放弃了原来的角色与主张，瓦杰帕伊要求法院进行公正裁决。

[3]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就是决定发展路线的基本标准不是为私人利益考虑，而是要有利于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国民收入和就业最终得到显著增长，而且要使收入和财富的占有更加平均。

参考文献：

- 1.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
- 2.[英]G·T·加勒特主编：《印度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3.赵鸣歧：《印度之路》，学林出版社，2005。
- 4.[美]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发展经济学前言——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 5.[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2001。
- 6.李晓：《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7.[美]黄亚生：《中印经济增长中的软硬基础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1 期。
- 8.[美]黄亚生：《龙象之争》，载《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06 年 3 月 17 日；<http://www.e-economic.com>
- 9.[英]马丁·沃尔夫：《印度经济能够超越中国吗？》，《金融时报》中文网，2006 年 2 月 17 日。
- 10.[日]绘所秀纪：《印度经济的自由化与 IT 革命》，[日]APC《亚洲太平洋研究》第 14 号，2004 年 2 月。
- 11.陈志武：《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载《财经日报》2006 年 4 月 25 日。